

科學譯叢

蘇維埃民族學的發展

С. П. 托爾斯托夫等著

科學出版社

科 学 译 丛

苏維埃民族学的發展

С. И. 托尔斯托夫等著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譯

科 学 出 版 社

1956 年 7 月

內 容 提 要

民族学是歷史科学中的重要部門之一。苏联在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直接地帮助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說来，当然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文集从“苏維埃民族学”雜誌中选譯了七篇文章。前兩篇文章主要把苏联这門科学的基本內容、研究对象、歷史發展階段以及它在發展过程中和各个反動流派進行鬥爭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介紹。第三、四兩篇文章闡明了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和“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对于苏維埃民族学的意义。尤其是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在前一著作的基礎上所作出的該所工作改造的總結，对于馬尔的有害思想曾進行了徹底的批判，这将有助于我們全面地了解苏联这門科学的發展过程。其餘的一些文章則介紹了苏联目前在這一科学領域中的活動情况。此外，我們还选譯了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1951年民族学會議的決議。如果讀者把它和前述的文章联系起來閱讀，就可以看出苏联这門科学的發展方向和远景。

苏維埃民族学的發展

編譯者 歷 史 研 究 編 輯 部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東黃城根甲4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号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6年7月第一版

1956年7月第一次印刷

(京)0001-5,360

書号:0457 印張:4 18/25

開本:787×1092 1/25

字數:96,000

定價:(9)0.00元

目 錄

民族学的苏維埃学派·····	C. II. 托尔斯托夫(1)
革命前的俄罗斯民族学和苏維埃時代的民族学的	
基本發展階段(分期問題)·····	C. A. 托卡列夫(31)
根据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对苏联科学院	
民族学研究所工作改造的總結·····	C. II. 托尔斯托夫(60)
从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	
來看民族学的新任务·····	И. И. 坡切亨(77)
爭取民族学家与歷史学家的	
緊密合作·····	“苏維埃民族学”雜誌社論(93)
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	
一九五四年的工作·····	И. 佐罗塔列夫斯卡雅(101)
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民族学会議的決議·····	(108)

民族学的苏維埃学派

C. II. 托尔斯托夫

(一)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原則，为过去沙皇帝國統治下的發展水平極不一致的各族人民開闢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廣闊道路，因此也就向苏联民族学科学提出了廣泛的和重大的任务。

这些任务極其繁雜，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我國有數十个族的人民，他們具有不同歷史、不同族和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經濟結構和不同生活方式，而且其中很多族过去並沒有独立的國家活動，甚至在革命前，連自己的文字也沒有，要吸收这數十个族的人民享有充分权利地参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設，就極端需要根据全部的歷史事实和歷史特點对这些族的經濟、社会結構、文化和生活的一切特點進行全面的研究。

一九二一年斯大林同志在確定党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务時寫道：“要是从六千五百万的非大俄罗斯人口中間除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經經過工業資本主义時期的烏克蘭、別洛露西亞、阿捷尔拜疆的一部分和阿尔明尼亞以外，剩下的二千五百万左右的人口，主要为突厥人（土耳其斯坦、阿捷尔拜疆的大部分、達格斯坦、山嶽人、韃靼人、巴什基里亞人、基尔吉斯人等），它們沒有來得及經過資本主义的發展，還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自己的工業無產階級，大半还保存着游牧經濟和宗法式的民族生活方式（如基尔吉斯、巴什基里亞、北高加索），或者還沒有脱离半宗法半封建的生活方式（如阿捷尔拜

疆、克里木等)，可是它們都已經被吸引在蘇維埃發展的總的軌道以內了。

黨對於這些族的勞動羣衆的任務（除第一條所指出的任務以外）就在於：幫助它們消滅宗法封建關係的殘餘，以勞動農民蘇維埃為基礎，並用在這些族中間創立堅強的共產主義組織的辦法，與蘇維埃經濟的建設結合起來。這些共產主義組織要能夠利用俄國工農從事蘇維埃經濟建設的經驗，同時在自己的建設工作中考慮到每一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具體的經濟環境、階級構成、文化與生活之一切特點，不要機械地搬用只適用於別的、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的俄國中央地區的經濟措施。”^①

我們以上着重指出的斯大林同志的話，十分清楚地說明了蘇聯民族學科學在實現黨的民族政策的道路上有多麼廣闊的活動場所，而在完成這些任務的事業中，民族學學者所負的責任又是如何的巨大。

隨着情況的不斷發展，這些任務不是簡單化了而是日趨複雜了。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形式的、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建設工作，要求對於每一個族的文化遺產進行全面的研究。不久以前尚處在分離狀態下的一些族系和部落，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下已經不斷形成為準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這些準民族和新的民族（нация）之間的團結造成了民族自覺的增長，從而也就必然地引起了那些文化日益高漲的興起的民族（нация）和準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的人民羣衆對於他們本族的歷史的關切。

覺醒了的、向新生活邁進的蘇聯各族人民已經不能滿足於那些紛亂的族的起源的神話傳說了，他們有充分權利要求科學家來解答那些激動着他們的、有關其起源和歷史發展的問題。但是，由於許多族（народ）都沒有自己文字記載的歷史傳統，於是民族學家就得負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四四頁。

起重建這些遺忘了的歷史篇章的重任。

這些任務一開始就決定了民族學研究工作的廣闊發展和這一工作的方向。

俄國民族學在十月革命前已擁有一些優良的傳統^①。俄國民族學的發展曾受到十九世紀時俄國民主主義社會人士的解放的、人道主義的思想的影響，即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等人的思想的影響，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當時，俄國民族學擁有許多作出巨大貢獻的學術派別，其中必須特別指出的是莫斯科的阿魯青和柯瓦列夫斯基學派，彼得格勒的什捷恩別爾格和波哥拉茲學派。

但是，蘇維埃時代向我們的科學所提出的任務，是遠非遺留下來的革命前的俄國民族學工作者所能勝任的。蘇維埃國家所以一開始就注意民族學的幹部問題，其原因就在於此。

國內戰爭一結束，在我們國內就建立了第一批進行民族學教育的中心。按照什捷恩別爾格和波哥拉茲的倡議並在他們的領導下，在列寧格勒重新成立的地理學院中設立了民族學系，不久以後，在莫斯科的社會科學專科學校中設立了民族學組，後來又成立了大學的民族學系。阿魯青所創立的莫斯科大学數理學系人類學教研室廣泛開展了該部的工作，該室不僅培養了許多體質人類學方面的幹部，同時也培養了民族學方面和原始考古學方面的幹部。

在民族學方面與各大學中心同時展開廣泛活動的還有科學院，這裏除了積極推進本身工作的各個人類學、民族學的博物館以外，還成立了如俄國部落組成研究委員會（КИПС）這樣大規模的民族學中心。後來，該委員會改組為蘇聯各族人民研究所。於一九三三年該委員會又與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合併成為統一的、規模巨大的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

^① 見本人另一論文：“現代的民族學”，載“蘇維埃民族學”，一九四六年第一期。

民族學的工作，在從事組織（根據恢復十八世紀大規模綜合學術考察隊傳統的新原則）考察研究工作的各個最重要的綜合學術中心的研究科目中，——亦即在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和考察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研究科目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北方委員會的系統下，發展起來了一種嶄新的民族學工作的組織形式。這個蘇維埃的政府機構，負有一項最艱巨的任務，即復興蘇聯北部許多邊區的少數的、落後的、名符其實的原始的族（其中有許多在革命前夕已經瀕於絕滅的境地），並吸引他們參加蘇維埃的國家活動和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因此這個蘇維埃的政府機構也就自然特別重視民族學學者的積極幫助。同時，我們也看到大批大批的青年民族學家，其中大都是什捷恩別爾格和波哥拉茲的學生，被派往遙遠的該委員會的北部根據地去，而這些根據地後來也就是北部地區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心；他們做了蘇維埃國家機構的工作人員、教師和地方誌工作者，在北部地區工作了好些年頭，從而為給那些罕為人知的、在蘇維埃政府號召下向新的生活邁進的部族（народности）編寫專門著述積累了無比珍貴的材料。

在列寧格勒創立的一所高等學校——北部各族人民的專門學院，在歷史上第一次擔負起一項重大的任務，這就是從蘇聯北部邊區許多不久還是原始族的各族人民當中培養出一些政治和文化工作者，以及具有高度技術水平的專家。這個學院後來成為組織另一個大規模的民族學研究中心的基礎，即該學院所附設的科學研究協會。

早在革命的最初年代裏，為實現斯大林同志所制定的黨的民族政策的任務設立了另一所高等學校——東方勞動人民共產主義大學（它的任務是從沙皇俄國舊日殖民地的許多落後的各族人民中培養一批具有高度水平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其下也附設了一所科學研究協會；在這個協會的研究計劃中，民族學科目同樣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當時，馬爾所領導的莫斯科東方各族人民的族的文化 and 民族文

化研究所也展開了巨大的民族學工作，這個研究所也是為實現黨的民族政策而建立的，因而許多已經能夠進行獨立研究工作的蘇聯各個少數民族的優秀青年都被吸收為這個組織中的研究生。

在迅速發展並日益鞏固的蘇聯博物館網中——從各個中央博物館到縣（區）博物館，民族學工作得到特別廣闊的發展。不必說，後者大部分都是革命後設立的，就是舊有的許多中央博物館，在革命後也獲得了嶄新的發展遠景和工作規模。下面事實就可充分說明這點：在革命前，我國最古老的民族學博物館——蘇聯科學院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的編制人員，總共只有幾個工作人員，到一九二五年就達到了四十二人，而到一九三〇年時已超過了一百人。

列寧格勒國立俄羅斯博物館的民族學部門（現稱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和莫斯科中央民族學（народоведение）博物館（現稱蘇聯各族人民博物館），都廣泛地展開了工作。這兩個博物館展開的調查、搜集、考察工作，其規模都不亞於科學院的各個機構的工作。例如，一九二五年僅民族學博物館就組織了十四個考察隊：（一）馬里—烏德莫爾梯考察隊；（二）洗瓦什考察隊；（三）布良斯克—奧勒爾—加路格考察隊；（四）坡爾塔瓦考察隊；（五）達格斯坦考察隊；（六）徹爾克斯考察隊；（七）阿布哈茲考察隊；（八）阿塞拜疆考察隊；（九）烏茲別克考察隊；（十）克里木考察隊；（十一）哥美里—列日茨克考察隊；（十二）符業特魯加考察隊；（十三）卡西莫夫（梁贊省）考察隊；（十四）德米特羅夫（莫斯科省）考察隊。同年，俄羅斯博物館民族學部組織了八個考察隊：（一）薩雅諾—阿爾泰（Саяно-Алтайская）考察隊；（二）米奴辛斯克（Минусинская）考察隊；（三）拉伯蘭考察隊；（四）列寧格勒考察隊；（五）大俄羅斯考察隊；（六）烏克蘭考察隊；（七）克里木考察隊；（八）北高加索考察隊；以及五次小規模的關於民族學訪問。

基輔、哈爾科夫、明斯克、梯比里斯、塔什干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國首都的各綜合性博物館和專門的博物館是民族學研究工作的巨大中心。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博物館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不落後，而且往往還超過了它們的前輩，例如喀山的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的博物館就是這樣。

在許多省和縣(後稱區)(如莫斯科省、梁贊、平茲、加路格、科斯特羅馬、尼什諾卡哥羅德、薩拉托夫、托姆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德米特羅夫[莫斯科省]、卡西莫夫[梁贊省]、佩雷雅斯拉夫-扎列斯克[弗拉基米爾省]以及其他等地的)博物館中,產生了一些真正的民族學工作的重要根據地。

和各地博物館保持緊密聯繫的廣泛擴展了的科學團體網和地方誌機構網是民族學工作的重要基地。除了舊有的一些協會——如地理學會(該會的西伯利亞分會的活動特別卓著),莫斯科大学附設的自然科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愛好者學會,以及其他組織——的活動外,數十個新建立的、擁有數千會員的地方誌學會和支部,在促進對我國進行全面研究(其中包括對我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民族學研究)的事業上,組成了一條壯闊的羣眾戰線。

大多數蘇維埃自治共和國都成立了綜合性的科學研究所,其中的民族學研究部門,幾乎都展開了自己的工作。在加盟共和國(如二十年代的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科學院的專門研究所和教研室中產生了重要的民族學工作中心。

在二十年代內,發表了大量的民族學材料。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出版了蘇聯民族學家的領導機關刊物“民族學”雜誌(從一九三一年起改稱“蘇維埃民族學”)。民族學研究院的博物館發表了“民族學研究院博物館彙集”,一九三三年以後改稱“民族學研究所論文集”(一九四七年博物館的彙集復刊並與“研究所論文集”同時發行)。俄羅斯博物館出版了內容豐富的、編排精美的“民族學資料”。自然科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愛好者學會的民族學研究部也出版了它們的“研究報告”。

在國立物質文化史研究院的出版物中(如“通報”、“學報”以及個別叢刊,如“伏爾加河上游理論民族學考察隊論文集”),以民族學為主題的文章介紹得很多。在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中,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中,都出版了許多專門性的民族學雜

誌和叢刊。

(二)

蘇維埃民族學歷史上的這二十年代，可以說是積蓄人力和資料並解決有關蘇聯各族人民經濟、文化建設的迫切任務的時期。就工作規模來談（我們且不談工作的實際目的），這一時期已經遠遠超過了革命前民族學所達到的一切成就，但從理論方面談，我們還不能說本世紀二十年代的蘇維埃民族學和本世紀初期的俄國民族學之間有什麼可作表徵的原則性區別。同時，不能不指出，在這些年代，蘇維埃民族學的發展是在劇烈的階級鬥爭的條件下、是在剝削階級瘋狂反抗轟轟烈烈社會主義進攻的條件下進行的。也不能不指出這一事實：在這些年代，有許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別的代表曾竄入了中央及地方的民族學機構和組織，他們總是企圖把民族學和地方誌學的中心變成宣傳民族主義觀點的根據地。同時，一部分舊的資產階級教授企圖用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學派的觀點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地理解民族學所研究的現象，這種傾向也說明了我國劇烈的階級鬥爭的這一情況。應該特別指出，這一時期的革命前的俄國民族學，除了一些細微末節的地方外，並沒有受到這一“現代流派”的感染，它仍然走着自己的道路，並保持了十九世紀先進俄國民族學的進步傳統。但在二十年代末，突然出現了一種傾向，這就是大力宣傳格列布聶爾、什米特、弗羅班尼烏斯以及其他所謂“文化圈論學派”代表人物的觀點，這一點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И. Ф.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理論民族學教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這些流派甚至影響到了像B. T. 波哥拉茲這樣的俄國民族學先進代表，他在這些年代裏出版了一本荒謬絕倫的書“世界文化分佈（民族學基礎）”，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出“文化圈論”的特殊反映和弗羅班尼烏斯“文化形態學”學說體系對它的肯定無疑的影響。

諸如此類的著作所以會順利地發表，是因為蘇維埃民族學家的理論還不夠成熟，還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應用於民族學研

究工作的實踐。

但是，到二十年代末期，出現了理論上大變革的最初一些標誌，這些標誌可以認為是作為一個特殊理論派別的蘇維埃民族學學派形成史的開端。從一九二九年到三十年代中期這一階段的特点是：在共產主義研究院、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協會、在一九二九年列寧格勒的民族學會議上、在一九三二年的考古學—民族學會議上以及各種專門雜誌（如“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民族學”、“蘇維埃民族學”及“國立物質文化史研究院通報”）中，對民族學的任务和對象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理論上的爭論。在這個時期，對外國資產階級民族學和人類學的各個現代學派、首先是對各種各樣的種族主義的流派和所謂“文化圈論學派”，以及對前述的俄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流派進行了深刻的批判，當時，蘇聯民族學學者在批判地改正自己觀點的過程中，也展開了為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而進行的鬥爭。不能不指出，在展開這些爭論時，反科學的、冒牌馬克思主義的坡克羅夫斯基學派和直接的暗害者——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派的破壞分子的影响曾起了極壞的作用，他們提出一些有害的、粗俗不通的“理論”來冒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否定民族學和考古學應該作為獨立的歷史學科而存在，企圖用先驗論的社會學公式推理（把一些信手抓來的考古學和民族學的實例只是當作這種推理的印證）來代替具體研究，這樣就不能不使蘇維埃民族學和考古學的發展遭到嚴重的損害。

黨和政府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三四年）結束了社會學公式主義者的統治情況，並為蘇維埃歷史科學的發展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從而為民族學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蘇聯民族學家在這次爭論中，從理論上重新武裝了自己，他們在反對國內外資產階級民族學反動流派和反對冒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公式主義的鬥爭中成長了起來。

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掌握辯證唯物主義並將之用來研究民族學材料的這項重要工作，在三十年代中期開始發表的

一些新的研究論文的性質上，立刻得到了反映。

这些著作的主题，和二十年代最盛行的那些著作的主题比较，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因为这些著作的特点就是集中地注意研究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问题。在二十年代末期，研究宗法关系与封建关系、或与半封建关系结合的各种具体形式的问题，被当作苏维埃民族学中心问题之一而被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而这一类关系的结合可以作为此时期苏联东部和北部大多数族的特征，同时这类结合形式的研究，还具有拟定苏联民族边区社会主义建设具体方针的目的，因而——正如我们所知——也是首要的政治经济任务之一。

在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尤其从三十年代的中期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苏联各族人民社会组织的历史—民族学研究的著作，例如，对氏族公社结构的传统和形式的阐明和分析，对氏族公社结构的形式和传统与封建主义成分及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和分析，氏族公社结构的传统和形式在苏维埃时代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历史意义。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都是依据认真提供出的野外调查材料写成的，同时还把大量的新材料作了科学的处理。这些著作中有一类是用大部分力量研究过去的，亦即为了阐明调查者所接触到的那些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古代根源的；另一部分则首先把现在尚未失去现实意义的那些要点记录下来。有些著作企图把社会关系作一全盘的综合；有一些则只研究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但是，所有这些著作都统一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倾向：根据个别具体族的具体材料，对原始社会组织的历史、它的作用和命运、它在过去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中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残余，提出最一般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来了解和解释新的具体材料，同时另一方面，并引用自己的材料对这一学说作进一步的探讨^①。

① 这类著作如下：И. И. 库什涅尔：“基尔吉斯山地”，一九二八年莫斯科版；С. 维里乞夫斯基：“库尔斯坦社会形态史资料”，载“苏维埃民族学”，一九三二年第五至六期；Н. 比里宾：“游牧的柯尔克人的阶级分析”，一九三三年海参威版；

除了根据苏联各族人民的材料对上述範圍內的問題作了研究以外，还發表了許多有關原始社会史一般問題的論著，这些論著廣泛运用了外國的材料（如澳大利亞的、美拉尼西亞的、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材料）。這裏佔特別主要地位的有柯斯文的大部頭論著，尤其是他專門研究母權制的歷史地位問題的著作；另外还有已故的 E. Ю. 克列乞夫斯基的出色的短小精悍的論叢，有 A. M. 佐罗塔也夫等人的著作。从这些著作的許多題目可以看出，它們不僅以研究社会制度本身为限。在波塔波夫、康達烏罗夫、別尔恩什坦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我們看到新的研究面貌，这就是对物質文化現象、經濟生活、生產技術、住屋等等的研究。在阿布拉姆容、佐罗塔也夫、托尔斯托夫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我們还可以看到对宗教信仰的研究。但是，不管在那一种情況下，这些現象都是从它們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中來加以考察的，亦即根据社会發展的基本規律——形成社会結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規律——在各种各样具体事物上所表現的狀態來加以考察的。

同一作者所著“柯略克人的交易”，一九三四年列寧格勒版；C. II. 托尔斯托夫：“游牧社会中封建制度的起源”，一九三四年“國立物質文化史研究院通報”，第一〇三號；A. H. 別尔恩什坦：“亞洲游牧民族關係瓦解的問題”，載“蘇維埃民族學”一九三四年第六期；M. O. 柯斯文：“托養制”（“Адаптация”），是过去在高加索各族人民之間流行的一種風俗。父母把初生下來的子女交給別家撫養，待子女長大後方由撫養者交還其父母；如此在撫養人與親生父母之間建立了一種特殊親密的關係；形同骨肉至親。這一制度初產生於氏族結構的條件下，而在封建制度的條件下則變為王公與貴族家庭之間的一種聯系形式。——譯者註，載“蘇維埃民族學”，一九三五年第二期；Л. II. 波塔波夫：“北部阿爾泰部落氏族制度的崩潰”，一九三五年列寧格勒版；托尔斯托夫：“土爾克明人的圖騰制和二胞族組織的殘餘”，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問題”，一九三五年第九至十期；C. A. 托卡列夫：“額魯特的前資本主義的殘餘”，一九三六年列寧格勒版；H. A. 基斯略柯夫：“塔什克山山地人瓦罕一波羅原始共產主義制度的遺跡”，一九三六年列寧格勒版；A. Ф. 阿尼西莫夫：“愛文克人（通古斯人）的氏族社會”，一九三六年列寧格勒版；柯斯文：“南沃舍梯氏族制度史”，載“蘇維埃民族學”一九三六年第二期；A. M. 佐罗塔也夫：“烏里池人的氏族制度和宗教”，一九三九年伯力版；H. II. 尼庫爾新：“愛文克人的原始生產聯合和社會主義建設”，一九三九年列寧格勒版；A. H. 康達烏罗夫：“雅格諾布人的宗法式家庭公社及公社家庭”，一九四〇年列寧格勒；以及其他著作。

以上所举出的以及尚未举出的著作，並不全都具有相同的理論水平，其中很多有着不少个别錯誤的和陈腐的論點。但是，它們都反映了苏維埃民族学發展的總路綫，这就是徹底的歷史主义的路綫，就是用歷史唯物主义的觀點从現象的發展、運動、鬥爭和質变中，解釋这些現象的路綫。

(三)

徹底的歷史主义是民族学中苏維埃学派的特點。在外國民族学的許多派別中，最典型的情况就是把民族学和歷史学对立起來，而把前者列入地理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等学科的範疇，这种情况是和那种作为种族主义的根源之一的陈舊的、反動的主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这种主張就是把人類分为“有歷史的”、“有文化的”(Kulturvölker) 人和“沒有歷史的”、“自然的”(Naturvölker) 人，而認為後者似乎才是民族学的对象。这种劃分是和苏維埃的科学背道而馳的，因为苏維埃科学是把世界各族人民当作人類存在全部歷程中的創造歷史的主体來加以考察的。当然，重建那些沒有文字的各族人民的歷史和重建那些具有文字歷史傳統並保存有自己过去文字遺跡的各族人民的歷史，所採用的方法是各異的。在這裏，起主要作用的，除考古学文献外，就是民族学文献。但是，這裏差別只在於史料的性質上和研究的具体方法上，而在研究对象上和研究的一般方法論上並沒有什麼不同。

苏維埃民族学家是根据某一个族（決不僅限於沒有文字的和原始人的）的民族和人种的特徵研究其文化的，因此總是歷史主义地对它進行分析。从文化上闡明該族各个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層次，从而根据这种文化看出該族的全部錯綜複雜的过去歷史命运的反映。苏維埃民族学早就超过了从前在資產階級民族学歷史上起过積極作用但久已顯然陈舊了的、用進化論对待民族学材料的觀點；資產階級民族学派別完全忽略了他們所研究的具体族的歷史，只是把它們的个别文化因素用來重建一幅有關原始人類進化的總圖表。但

是，只有通过每一个族的歷史，才能說明它的文化中每一个因素的歷史意义，同時，我們很清楚地知道，从歷史的來龍去脈中摘出一些个別的文化現象（例如馬來亞氏族制的現象），这种作法往往会使進化論者造成怎樣的錯誤（甚至像摩尔根这样一位在方法上不可估計地高出於一切進化論者的大師也不能例外）。必須着重指出，最近在外國，尤其在美國的民族學文獻中出現了一種以剔除摩尔根（路易）觀點中的所謂“極端主張”為條件從而“恢復”進化論的傾向。另一方面，摩尔根的擁護者（J. 怀特）則企圖以摩尔根為旗幟來為重建進化論傳統而進行鬥爭。[⊖]事實上，摩尔根所以具有威望並不因為他是一個進化論者，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無容爭辯，他在方法論上的進化論因素是使他在個別結論上造成錯誤的弱點，但這決不影响他的整個學說，這個學說曾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應有的評價，而直到至今天仍然是不可動搖的。如果說恩格斯有一切根據說摩尔根自己獨立發現了唯物史觀，那末馬克思在其著名的對巴斯梯安一書的批評中，却嚴厲地指責了方法論上的那些進化論的原理：“巴斯梯安著的‘歷史上的人類’（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三厚冊，作者是布勒門的一個青年醫生，曾作過一次歷時多年的世界旅行）企圖以自然科學來解釋心理學，同時以心理學來解釋歷史，——這是拙劣、混亂、糟糕的事”[⊗]。

蘇維埃民族學的歷史主義和現代外國民族學——各種變相的“文化歷史學派”——中的某些流派的偽歷史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大家知道，這一學派的理論主張最初由 Ф. 格列布聶爾提出來，它從里克爾特（G. Rickert）的觀點出發，否認歷史的規律，把歷史變成一些個人的、从不重複的事件和現象的總和，而歷史學家的任務似乎就是從時間和空間上把它們加以系統化。

⊖ M. 列文：“歷史、進化、傳播（關於一項爭論）”，載“蘇維埃民族學”，一九四七年第二期第二三五頁以下。

⊗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五五二頁。

蘇維埃民族學家，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歷史過程的理解為根據的。他們並不忽視由各種各樣歷史因素所決定的歷史過程的複雜形式（在這一問題上，列寧所指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普魯士式的和美國式的，是我們的空前卓越的典範），而是把這些形式看作統一的、雖然是極端複雜但仍與自然發展規律一樣確定不移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表現。無論是民族學、歷史學或任何一般科學的研究，其目的就是揭露這些規律中尚未弄清楚的那些方面。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所揭示了的這些規律便是保證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是理解這一五色繽紛的、乍看起來往往顯得雜亂無章的圖畫（每一種具體的文化都是這樣的圖畫）的鎖鑰。

蘇維埃民族學在對每一具體族的文化起源和發展進行具體的歷史研究時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為依據的，這些特徵是蘇維埃民族學和現在外國民族學的主要派別顯然不同的地方。如果說在二十世紀的最初二十五 years 內，資產階級民族學發展中的代表傾向是偽歷史主義的傾向，亦即以里克爾特學說為代表的竭力反對揭露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歷史主義”傾向，那末在這一世紀的後二十五 years 內，一眼即可看到一種赤裸裸的敵對傾向，這就是突出的反歷史主義傾向。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學中勢力最大的兩個學派是英國的“功能學派”（現在在美國也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美國的所謂“心理學派”，它們恰恰具有這樣的特色，這兩個學派是最堅定地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英國功能學派的美國追隨者和繼承者——采勃里和庫恩在確定功能主義的鼻祖 Б. 馬凌諾斯基及其同道者的“功績”時說：“……在將近二十年前，發生了變化（民族學理論上的——托爾斯托夫），當時很多權威人士開始認識人類學（антропология）^①可以應用到殖民地的管理工作中去，應用到調整白種人和所謂‘未開化’人之間的關係的這一特殊領域。不列顛政府曾把這一發現作為殖民地管理方法

① 英美國家把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用來指 этнография（民族學），但我們以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指 физиче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體質人類學）而言。